

转向“去欧洲化”：民粹主义影响下的欧盟对外政策

姜昊¹ 冯仲平²

【内容摘要】近年来，一些欧盟成员国在对外政策领域出现“去欧洲化”现象。作为“欧洲化”的镜像，“去欧洲化”表现为成员国利益的“再国家化”，对欧盟基本规范的质疑甚至反对，以及在欧盟框架之外寻求替代性方案。从深层逻辑看，“去欧洲化”实质是对外政策的反规范社会化，即对“欧洲化”过程中规范社会化成果的侵蚀。推动这一进程的核心因素是民粹主义，它既可以通过建构疑欧思潮影响对外政策，也可以在民粹政党执政后直接介入决策，从而引发反规范社会化并推动“去欧洲化”。“去欧洲化”对欧盟对外政策的一致性与稳定性构成了挑战。目前，中小成员国的“去欧洲化”更多体现为欧盟内部力量的平衡博弈，尚不足以全面挑战欧盟，但已暴露出隐患。未来，法国和德国等核心国家民粹主义的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去欧洲化”的风险是否会上升为对欧洲一体化的整体性冲击。

【关键词】“欧洲化” “去欧洲化” 民粹主义 欧盟对外政策

【作者】 1 姜昊，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2 冯仲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洲对外战略调整与中欧美关系研究”（21&ZD171）；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C20241988）

引言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始终是欧盟对外政策^①的重要目标。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尖锐地指出：“如果我想打电话给欧洲，该拨哪个号呢？”^②这反映出在早期阶段，欧共体在对外行动领域远未达到经济领域那样的一体化程度。随着欧盟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在



《里斯本条约》(Treaty of Lisbon)生效后,多个维度的对外政策被置于统一框架内,难以“用一个声音说话”的问题在制度层面得以解决。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对外政策互动被称为“欧洲化”(Europeanisation),它既是制度协调过程,也逐步发展为规范塑造过程。

然而近年来,“欧洲化”进程遭遇挑战,部分成员国难以与欧盟的对外政策协调一致,甚至与之背离。这种背离现象不是简单的政策立场分歧,更体现为成员国绕开欧盟框架,重新强调本国利益,重塑对外行动规范。此类现象不仅出现在中东欧地区的“新欧洲”国家,如波兰在2015年宪法危机中与欧盟对外立场的冲突;也发生在部分传统西欧国家,如意大利在2018年难民危机期间对欧盟政策的抵制,更典型的是英国脱欧后在对外政策上与欧盟的全面断裂。成员国对欧盟的背离涵盖多个政策领域,既有政府间方式主导的对外政策(如安全防务),也涉及具备高度一体化程度的共同体方式对外政策(如对外贸易和难民庇护)。对此,学界提出了“去欧洲化”(de-Europeanisation)的概念,指代成员国系统性脱离欧盟对外政策的过程,^③更有学者指出“欧盟对外政策正在去欧洲化(de-Europeanise)”。^④

现有研究已初步揭示“去欧洲化”的制度性特征,即成员国在特定政策领域与欧盟制度的结构性脱离,并指出民粹主义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⑤然而,制度视角的解释力仍然有限,难以充分探究欧盟对外政策运行中更为关键的规范共识变化。对此,本文拟基于“欧洲化”的研究范式,系统梳理“去欧洲化”的内涵,指出其本质是一种“反规范社会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民粹主义—反规范社会化—‘去欧洲化’”的分析框架。通过引入“反规范社会化”的概念,本文旨在揭示民粹主义如何侵蚀成员国对欧盟规范的认同,从而驱动“去欧洲化”,为解释欧盟对外政策协调机制的失效提供新的思路。

“去欧洲化”的概念及特征：“欧洲化”的镜像

理解“去欧洲化”的内涵与机制,需立足于既有的“欧洲化”研究范式,厘清二者之间的概念关联与路径分野,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核心特征。

(一) 概念溯源：从“欧洲化”到“去欧洲化”

成员国与欧盟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互动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研究的重要领域。20世纪90年代,随着欧盟制度体系的确立,“欧洲化”概念应运而生。莱德里希(Robert Ladrech)于1994年最早提出了这一概念,认为欧盟层面政治的运行逻辑会逐步渗透进成员国国内政治。^⑥随着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学界进一步拓展了“欧洲化”的规范性含义,引入“社会化”视角。博泽尔(Tanja A. Börzel)指出,在“欧洲化”的过程中,成员国内部的规范和信念会受到欧盟影响,并逐步向欧盟靠拢。^⑦无论是功能主义的理性范式,还是建构主义的社会化路径,“欧洲化”的过程性都是显著的。针对“欧洲化”的过程,学界逐步发展出了单向、双向和交叉传达等多种形式的理解。其中,最早对于“欧洲化”的理解是单向的,强调欧盟对成员国的影响,如斯威特(Alec Stone Sweet)等认为“欧洲化”是欧盟对成员国垂直制度化的过程。^⑧与之相对的是,博泽尔指出成员国既可以适应欧盟的对外政策与偏好,又会反过来塑造欧盟。^⑨基于此,学界提出了“没有欧盟的欧洲化”,即在欧盟外交和安全领域尚未一体化的背景下,“欧洲化”就已经在部分成员国内部启动,^⑩换言之,“欧洲化”并不是欧盟先形成完整制度和规范,再推动成员国建立制度和建构认同,而是成员国与欧盟相互塑造,最终使得成员国对外政策与欧盟协调一致的过程。



2009年《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成员国与欧盟对外政策的一致性在制度和法律层面进一步加强，但是，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等重大危机爆发后，部分成员国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背离欧盟立场。以爱沙尼亚为例，其1994年至2004年的区域政策经历了明显的“欧洲化”，但在加入欧盟后，爱沙尼亚在这一领域却逐步偏离欧盟的价值观，拉格玛（Garri Raagmaa）将这一过程定义为“去欧洲化”。^①在英国脱欧前后，部分学者开始探讨英国脱离欧盟政策的过程，如科普兰（Paul Copeland）指出卡梅伦政府在制度与规范层面根本性地脱离了欧盟改善就业政策框架，构成典型的“去欧洲化”现象。^②在早期以个案研究为主的基础上，2021年《欧洲一体化杂志》（*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推出了一组专题文章，通过分析意大利、希腊、波兰、爱沙尼亚等国家在部分对外政策领域背离欧盟的现象，指出“欧洲化”以镜像的方式回来了，^③即“去欧洲化”。“去欧洲化”需要从三个维度加以界定：首先是过程性，同“欧洲化”类似，“去欧洲化”是渐进的过程；其次，它以“欧洲化”为前提，具有一定“欧洲化”程度的国家才会出现“去欧洲化”；最后，作为与“欧洲化”相反的过程，“去欧洲化”意味着成员国在部分领域难以与欧盟对外政策协调一致，在制度和规范方面背离欧盟。

结合现有研究，可以对“去欧洲化”进行初步界定。“去欧洲化”是指具有一定“欧洲化”程度的成员国背离欧盟对外政策的渐进过程。与“欧洲化”进程中成员国的制度和规范向欧盟靠拢、并与欧盟对外政策协调一致不同，在“去欧洲化”过程中，成员国排斥欧盟对外政策的制度与规范，甚至在具体政策的执行中挑战欧盟对外政策的集体决策。

（二）判断标准：“去欧洲化”与政策分歧的区别

成员国挑战欧盟对外政策容易被理解成政策分歧。所以，需要更进一步明确“去欧洲化”的标准，从成员国挑战欧盟对外政策的话语范畴、行动规模和基本立场三个方面进行判断。^④“去欧洲化”不同于一般的政策分歧，其关键在于成员国对欧盟对外政策的实质性排斥与结构性脱离。

首先，在话语范畴上，“去欧洲化”不仅表现为成员国在言辞层面对欧盟表达不满，更表现为在具体政策领域对欧盟形成实质性挑战。如意大利在“五星运动”和联盟党组成的民粹政府执政时期，联盟党党首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在众多场合表现出了与欧盟立场相悖的政策偏好，但学者们通过研究意大利在联合国的投票，认为意大利整体上依旧与欧盟保持一致，只有极端的难民政策是背离欧盟的，^⑤所以应将意大利的难民政策视作“去欧洲化”案例，而不能将意大利整体上定义为“去欧洲化”的国家。其次，在行动规模上，“去欧洲化”相较于政策分歧更具结构性，如欧债危机期间，希腊和葡萄牙在对外贸易领域均与欧盟产生了分歧，葡萄牙后续与欧盟展开了谈判协商，希腊则直接加入了欧盟以外的贸易机制，显示出其在该领域已脱离欧盟框架，进入了“去欧洲化”。^⑥换言之，只要成员国与欧盟还处于良性互动中，其行为就属于正常范围内的政策博弈，不足以构成“去欧洲化”。最后，在基本立场上，“去欧洲化”意味着成员国在具体的对外政策领域突破了妥协的边界，站在欧盟基本立场的对立面。如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波兰民粹政府就与欧盟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并更多地在维谢格拉德机制中或利用波美双边关系来处理这一问题，这意味着波兰在关于巴以冲突的政策领域出现了“去欧洲化”。^⑦

（三）“去欧洲化”的基本特征

在“欧洲化”进程中，成员国与欧盟在利益、规范和机制三个方面进行协调，以实现对外政策的一致性。而在与其相反的“去欧洲化”进程中，上述三个方面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导致原有“欧

洲化”成果被侵蚀和削弱，这也构成了“去欧洲化”的基本特征。

首先，“去欧洲化”进程中的欧盟成员国重新强调本国利益的重要性，即利益的“再国家化”。成员国对本国利益的强调既表现在政策和话语上，也表现在外交机构的构成上。在政策和话语层面，成员国在“欧洲化”进程中往往兼顾本国利益和欧盟作为统一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但是在“去欧洲化”中，成员国会在部分领域优先捍卫本国利益，而不是以欧盟的集体利益为重，甚至要求欧盟“返还”利益与权力，如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脱欧公投前曾表示“欧盟应该在部分领域将权力归还成员国”。^⑧与此同时，成员国在外交机构上也会做出调整，这在民粹主义者执政的国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次，成员国在“去欧洲化”进程中会反对欧盟部分对外政策规范，主要体现在成员国质疑甚至违反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中的程序规范。在CFSP的实践中，成员国逐步形成了一种合作性的文化，即信息共享、立场磋商、行动协调和政策趋同，共同构成了程序规范。^⑨而在“去欧洲化”进程中，部分成员国对这些程序规范提出质疑，甚至在实践中违反程序规范，从而削弱欧盟在这一领域形成共识和达成妥协的能力。^⑩

最后，在对外政策的具体机制方面，“去欧洲化”意味着成员国在部分领域排斥或规避欧盟现有的程序框架，尝试在其他（双边或多边）框架中展开对外行动，即“脱离”欧盟对外政策结构。就当前的欧盟成员国而言，这种“脱离”并不意味着直接退出欧盟，而是在某些议题上使用欧盟以外的对外政策框架。有学者指出，欧尔班领导下的匈牙利并没有真正考虑过退出欧盟，而是在部分问题上使用替代性机制与欧盟展开对抗，表现出对欧盟的批判、阻挠和偶尔的“敲诈”。^⑪此外，部分欧盟成员国在对外行动中的次区域化和小集团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去欧洲化”的表现。

民粹主义与“去欧洲化”

欧盟对外政策由“欧洲化”转向“去欧洲化”的过程，涉及多个层面的复杂动因，不仅包括外部压力，也涉及成员国内部政治生态的变化。其中，民粹主义被视为驱动“去欧洲化”的核心因素。^⑫民粹主义对欧盟对外政策的深层影响体现在规范层面，要理解民粹主义对“去欧洲化”的驱动机制，必须从“去欧洲化”的规范性实质出发，进一步厘清民粹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的驱动方式和政策领域偏好。

（一）“反规范社会化”：“去欧洲化”的深层逻辑

作为“欧洲化”的镜像过程，“去欧洲化”与“欧洲化”在实质和深层逻辑上呈现出根本性差异。对于“欧洲化”的实质，不能仅依赖理性制度主义视角来理解，因为这一过程并非建立在等级制关系上，而是在成员国意愿基础上的非等级制关系中进行的，所以，学界引入了“社会化”的相关概念对其加以解释。切克尔（Jeffrey T. Checkel）最早指出，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社会化是将共同体规范内化的过程，并提出了“战略性计算”（Strategic Calculation）、“角色扮演”（Role Playing）和“规范性劝说”（Normative Suasion）三种方式，分别对应理性范式、认知心理学和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⑬基于此，弗勒斯（Nicole Alecu de Flers）和穆勒将社会化机制应用于“欧洲化”研究，认为成员国通过“基于规范的争论”（norm-based arguing）来调整自身行为（对应“战略性计算”和“角色扮演”），或通过“规范性劝说”来完成身份认同的



转变。^{②4}成员国通过社会化受到了欧盟规范和认同的影响，并与欧盟协调一致，这也构成了“欧洲化”的深层逻辑。因此，“欧洲化”的实质是成员国在对外政策领域的规范社会化（norm-based socialization）。

而“去欧洲化”则意味着欧盟的核心规范性承诺受到了侵蚀，^{②5}结合前述“去欧洲化”的三个基本特征，可以探讨其实质和深层逻辑。“去欧洲化”的前两个特征，即利益“再国家化”和反对欧盟规范，会改变成员国“基于规范的争论”，进而导致成员国行为的改变。具体来说，成员国利益的“再国家化”会影响到社会化中“战略性计算”的方式，在涉及利益权衡时成员国会更多地考虑自身的相对收益，而不是成员国与欧盟共同的绝对收益。与此同时，成员国对欧盟基本规范的否定，则会对社会化中的“角色扮演”产生影响，因为基于认知心理学的“角色扮演”的前提就是行为体接纳共同体规范，一旦成员国的“角色扮演”不再基于欧盟的规范，其行为也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去欧洲化”的第三个特征“在欧盟框架之外行动”则会影响到社会化“规范性劝说”的过程。由于成员国在部分领域倾向于脱离欧盟对外政策的框架，所以在这些领域中欧盟框架的“规范性劝说”也难以达成，换言之，成员国脱离欧盟框架就是在规避“规范性劝说”。总体来说，成员国的“去欧洲化”就是在各个维度上对社会化进程的破坏，并向其反方向发展，所以，“去欧洲化”的本质和深层逻辑可称为“反规范社会化”。“反”的内涵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其一是反对规范社会化，即破坏成员国已有的规范社会化工具和成果；其二是成员国在某一领域的对外政策向规范社会化的相反方向发展。通过对规范社会化中三个机制的反向拆解，引入“反规范社会化”概念，可以更好地厘清“去欧洲化”的深层逻辑，并挖掘其中的驱动因素。

（二）民粹主义：“去欧洲化”的核心驱动因素

近年来，欧洲政治版图经历了深刻重构，民粹主义的崛起成为影响成员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变量。正如欧盟前“外长”博雷利（Josep Borrell）所言：“欧洲范围内的民粹主义正卷土重来，这对欧盟对外政策中‘基于多边主义规则的秩序’形成了严峻挑战。”^{②6}这一“卷土重来”的表述反映出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世界政治中的周期性现象，特别是欧洲新一轮民粹主义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在意识形态方面，欧洲民粹主义是一种“薄”的意识形态（thin ideology），^{②7}即缺乏核心价值观。基于此，民粹主义以塑造“人民—精英”对立关系为核心逻辑，并可以与多种意识形态相结合。在政党方面，基于意识形态的复杂性，部分新民粹主义政党“超越左右之维”，奉行混合型政策。^{②8}例如，意大利“五星运动”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强化了直接民主的形式，融合了左翼民粹主义对精英腐败的批判和右翼民粹排外的动员策略；^{②9}成立于2024年初的德国政党“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虽脱胎于德国左翼党，但在选举中系统性地借用右翼民粹主义的反移民话语，从而在左翼和右翼之间架起桥梁，展现出典型的混合民粹主义特质。^{③0}

尽管欧洲新民粹主义表现出一定复杂性，但其特征和诉求仍是鲜明的。民粹主义对“人民”群体的界定是其塑造对立的根本，但其所强调的“人民”并不等于全体公民，而是民粹主义话语中被界定的群体。通过划分群体并塑造对立关系，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核心诉求就是要重新强化国家主权。^{③1}同时，当前的欧洲民粹主义出现了与民族主义合流的趋势，这一趋势加强了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力量，也强化了极右翼反建制派挑战现有政治秩序的能力。^{③2}民粹主义在处理各项事务时，其行动方式都会基于它们所强调的“人民”与“精英”的对立关系。因此，在与国家发展相关的重要对外政策领域，民粹主义往往会与传统的建制派力量和超国家力量

进行对抗，传统的左右翼政治冲突正逐渐转化为民粹主义与主流派的冲突。^③在这一背景下，民粹主义系统性地削弱了成员国对欧盟规范的认同基础，成为驱动部分成员国对外政策“去欧洲化”的核心因素。

（三）民粹主义驱动“去欧洲化”的方式

民粹主义通过塑造“人民—精英”的对立关系并不断扩大影响，在与主流建制派的对抗中引发反规范社会化，驱动了“去欧洲化”进程。民粹主义引发反规范社会化的方式有两种（如图1所示）：第一种是在成员国内部建构疑欧思潮，并作用于部分对外政策领域，从而削弱欧盟规范的约束力；第二种是民粹主义政党组建政府，主动介入特定的对外政策领域，进而对规范社会化产生影响。无论是何种方式，民粹主义均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欧洲化”过程中的规范社会化，是“去欧洲化”的核心驱动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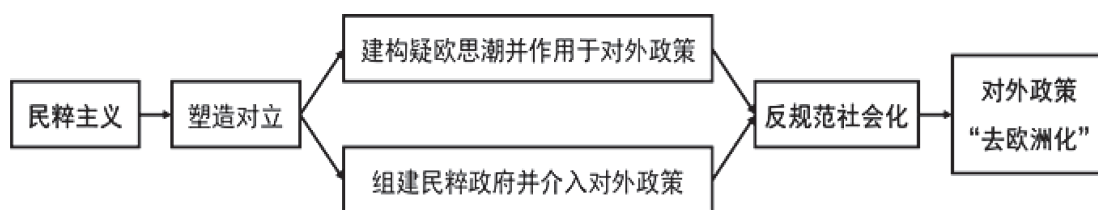


图1 民粹主义驱动“去欧洲化”的方式

在第一种方式中，以“疑欧主义”（Euroscepticism）为表现形式的疑欧思潮是导致反规范社会化的关键，它能够显著影响成员国部分领域的对外政策走向。“疑欧”即表达对欧盟的不信任，最早产生于撒切尔夫人的“布鲁日演说”，并逐渐演化为“疑欧主义”这一概念。疑欧主义是一种反对欧洲一体化的观念，其中既包含有限的条件性反对，也包括无条件反对。^④近年来，欧洲范围内民粹主义对建制派的反对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疑欧主义。不同于其他地区，欧洲民粹主义具有独特的疑欧特质，“欧洲民粹主义与‘疑欧’并肩而行”。^⑤疑欧与民粹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疑欧主义与民粹主义是共同发展的。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根植于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等一系列冲击欧盟合法性的危机，这些危机催生了部分成员国对欧盟的质疑和不满，从而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发展基础，同时，民粹主义在难民等领域提出的煽动性议题也进一步强化了疑欧主义。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在塑造“人民—精英”的对立关系时，持续建构并使用具有疑欧主义特点的话语攻击主流建制派，以获取更高的关注度。总体而言，疑欧主义既是民粹主义发展的社会基础，也是其推动“去欧洲化”的关键话语工具。民粹主义通过建构疑欧话语，质疑欧盟对外政策规范，削弱成员国对欧盟规范性承诺的认同，导致其在部分领域出现反规范社会化倾向，从而驱动“去欧洲化”进程。

与民粹主义共同发展并不断由其建构的疑欧主义，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影响成员国的对外政策：第一，疑欧政党进入政府或议会，直接参与决策过程，不论是极端政党还是主流政党，都可能具备疑欧的倾向，此类政党采取疑欧立场是基于意识形态和选举策略的需要；第二，疑欧情绪在社会层面扩散，国家出于回应民意的考量，往往会调整对欧立场；第三，在具备公投条件的政治体制中，疑欧主义往往借助全民公投反对欧盟，体现出后功能主义理论强调的“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⑥由此可见，疑欧主义既能通过制度方式直接影响政策，又可以



通过舆论间接产生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民粹主义将其建构的疑欧思潮作为工具，并作用于对外政策。

在民粹主义通过建构疑欧思潮驱动“去欧洲化”的案例中，英国脱离欧盟对外政策的过程是一个典型，尤其是英国如何脱离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英国曾在欧盟共同防务的初期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英法两国于1998年发起了《圣马洛宣言》，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但在《里斯本条约》生效和CSDP正式确立后，英国对欧盟共同防务建设的态度转向质疑，并逐步从CSDP中脱离，表现出了明显的“去欧洲化”倾向，民粹主义所建构的疑欧主义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英国本就是一个具有疑欧传统的国家，其国内的疑欧主义在2009年后伴随民粹主义的崛起而泛滥。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ce Party）获得了16.5%的支持率，超过工党，排在英国第二位。虽然在两党制下独立党的实际作用有限，但有学者指出，英国保守党长期以来将民粹主义和疑欧主义融合，右翼民粹政党和中右翼政党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④作为主流政党的保守党吸纳了部分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并在建构疑欧主义中发挥关键作用。面临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挑战，英国保守党采取了民粹主义策略，加剧了“留欧派”和“脱欧派”的两极分化，^⑤并使其建构的疑欧主义直接作用于英国的对外政策，引发了反规范社会化。在CSDP框架下，永久结构性合作和欧洲防务局是重要的机制和机构，前者的设想是提高欧盟共同防务的行动力，后者则是针对欧盟的防务预算。然而，在疑欧主义盛行的英国看来，永久结构性合作被认为具有过强的制度约束性，可能会损害英国的防务主权；^⑥而欧洲防务局的预算管理功能不可避免地使其与欧盟委员会保持紧密联系，进而引发后者对CSDP事务的干预，这与英国推崇以简化的政府间合作机制来处理安全与防务事务的原则相悖。基于上述认知，英国政府逐步减少对欧盟的防务预算特别是对欧洲防务局的支持，否定“欧盟防务市场指令”，^⑦并逐步在其他框架中进行防务建设，如通过《兰开斯特宫防务合作协议》与法国建立双边防务合作，在北约框架内展开对外行动等，逐步脱离了欧盟共同防务建设。由此可见，在由民粹政党和采取民粹策略的主流政党共同建构的疑欧主义影响下，英国政府在防务政策中逐步削弱对欧盟集体规范的承诺，推动了防务政策领域的反规范社会化，导致这一领域的“去欧洲化”。

在民粹主义驱动成员国“去欧洲化”的第二种方式中，民粹主义政党组建政府并主动介入对外政策，是导致反规范社会化的关键。主流政党执政期间倾向于对外政策的去政治化，而民粹主义政党则试图将对外政策重新政治化，即“去欧洲化”。^⑧一旦执政，民粹政党便依据其对外政策偏好和动员逻辑，调整成员国对外政策的运行方式，具体表现为对外机构优先事项、权力结构和组织文化的系统性重塑。^⑨首先，在对外机构的优先事项上，民粹政府强调国家利益优先，倾向于将更多资源放在国家层面而不是欧盟层面，并调整外交机构的人事安排。其次，在外交决策的权力结构上，民粹政府直接推动民粹领导者参与对外决策，而非依赖传统的外交官和技术官僚渠道，这使得擅长专业协商的传统外交官在欧盟事务中被边缘化。最后，在组织文化层面，民粹政府会调整外交人员的遴选和培训标准，排斥欧盟层面的规范和价值观。

在此种方式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民粹主义政党的对外政策偏好，即民粹政党是否重点关注对外政策议题并塑造“内部—外部”的对立。虽然欧洲新民粹主义大多具有疑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质，但也有部分民粹政党重点依靠内部议题获得发展，缺乏对外政策偏好，此类政党即便执政，

也不会导致成员国出现明显的“去欧洲化”。如捷克在民粹主义政党“不满意公民行动 2011”(ANO)参与执政时期,其对外政策仍由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主导,并没有在根本上质疑或反对欧盟对外政策规范,没有出现“去欧洲化”。其原因有两个,一是 ANO 不关注外交事务,没有掌控外交决策机构;二是 ANO 缺乏对外政策决策的专业知识,不仅缺少外交事务专员,也没有形成类似波兰和匈牙利民粹主义政党的“全面的世界观”(comprehensive worldview),ANO 的政策是高度机会主义的。^④所以,民粹主义驱动“去欧洲化”的第二种方式要准确地表达为“民粹主义政党组建政府并主动介入对外政策”,而不仅仅是组建了民粹政府。可见,民粹主义政党对“去欧洲化”的推动作用并非必然发生,这一过程高度依赖于此类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议题优先级和对外政策引导能力。因此,在分析“去欧洲化”时,需要细致区分不同民粹主义政党的属性和特征,避免将“民粹主义政党”简单视为推动“去欧洲化”的同质性力量。这一点也进一步印证了从规范视角分析“去欧洲化”的必要性与理论价值。

当民粹主义政党主导政府并介入对外政策议题时,其往往通过削弱成员国对欧盟规范性共识的认同,导致反规范社会化进程,进而驱动相关政策领域的“去欧洲化”。在由民粹主义政党执政并关注对外政策的意大利、匈牙利、波兰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去欧洲化”。以难民政策为例,为应对 2015 年爆发的难民危机,欧盟相继出台了《欧洲移民议程》《重新回归申根路线图》等政策文件,并建立“欧洲共同避难体系”,试图通过超国家方式解决危机。但在民粹主义政党掌权的意大利和匈牙利两国,难民政策出现了显著的“去欧洲化”。

在意大利,虽然 2016 年的伦齐(Matteo Renzi)政府积极配合欧盟,展开了应对难民危机的“海神”救援行动,但在 2018 年民粹主义政党上台并重点关注难民政策后,意大利的难民政策出现了“去欧洲化”转向。2018 年大选后,“五星运动”和联盟党联合组阁,虽然总理由以独立身份参选的孔特(Giuseppe Conte)担任,但由于本届政府受到两大民粹主义政党的强力制约,孔特的实际权力较弱,在外交事务的决定权上远不如伦齐等前任总理。两个民粹主义政党实际上主导了行政权,特别是对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针对难民问题,联盟党党首萨尔维尼直接利用社交媒体表示“我们不能把意大利变成难民营”,“我们需要进行大规模清洗”,^⑤以反对欧盟的难民政策。在担任相关职位后,萨尔维尼通过封锁港口阻止难民入境,并推动《领海管理法案》(又称“萨尔维尼法案”)的出台。意大利的难民政策在民粹政府时期的调整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关闭港口严禁各类救援船停靠;以“特殊保护”和“特殊案例”取代人道主义居留许可;使用更加严格的难民管理方式;加快难民的遣返。^⑥总体而言,意大利在该领域的政策全面背离欧盟立场,尤其是“萨尔维尼法案”的出台直接改变了意大利难民接纳的原则与方式,标志着意大利难民政策的“去欧洲化”转向。

在民粹主义政党执政的匈牙利,难民政策的“去欧洲化”也非常显著。民粹主义政党青民盟(Fidesz)通过民粹和民族主义的话语,吸引在转型和“欧洲化”中受损的边缘群体,借此赢得选举并上台执政,其领袖欧尔班就任匈牙利总理。针对难民问题,欧尔班认为欧盟的难民政策会重构匈牙利的族群、文化和宗教形象,因而予以坚决否定。为防止难民入境,匈牙利在边界地区修建围栏,授权军方使用强制措施驱离难民,其政策导向与欧盟形成明显对立。与此同时,匈牙利推动维谢格拉德集团明确拒绝欧盟的难民安置配额,强调“保持团结措施的自愿性质”。^⑦执政的匈牙利民粹主义政党不仅在价值层面否定欧盟关于难民治理的核心规范,还借助替代性区域机制与欧盟进行对抗,推动了该领域的反规范社会化,进而驱动“去欧洲化”进程。

（四）不同类型民粹主义驱动“去欧洲化”的领域差异

尽管民粹主义可以通过上述两种方式驱动“去欧洲化”，但不同类型的民粹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上有所差别，进而使得它们驱动“去欧洲化”的政策领域各有侧重。

通常而言，右翼民粹主义聚焦于国家主权和文化认同议题，尤其体现在移民与难民、安全与防务等“高政治”领域，匈牙利、波兰与欧盟的冲突^④即为典型案例；而左翼民粹主义则更多关注分配和社会公平方面的议题，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执政期间，对外贸易政策出现了“去欧洲化”。^⑤相较而言，右翼民粹主义驱动的“去欧洲化”在强度与广度上更为显著，甚至可能引发“民主倒退”风险；而左翼民粹主义往往局限于对现有制度的“纠偏”而非颠覆。^⑥此外，以意大利“五星运动”和德国“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为代表的混合型民粹主义，则呈现出议题选择上的“机会主义”特征，使“去欧洲化”进程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与不确定性。由此可见，民粹主义并非简单导致成员国在制度层面脱离欧盟，而是通过破坏规范共识、重塑对外政策议程，在成员国内部引发系统性的反规范社会化，从而驱动成员国的对外政策转向“去欧洲化”。

“去欧洲化”的影响与未来走向

成员国“去欧洲化”的走向不仅深刻影响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也将成为理解欧盟对外政策发展和欧洲一体化未来走向的关键维度。

（一）“去欧洲化”的影响

就欧盟对外政策的整体运行而言，成员国对外政策的“去欧洲化”不仅体现为部分领域议题的“离心化”，更意味着欧洲一体化中所依赖的规范认同正在出现裂痕。

一方面，“去欧洲化”削弱了欧盟对外政策的一致性。在欧盟对外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主要有四个领域的“一致性”需要解决，即横向的政策之间、欧盟不同机构之间、纵向的不同层次之间以及不同成员国之间。^⑦“去欧洲化”会显著削弱纵向不同层次之间的一致性，也会对成员国之间的一致性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去欧洲化”会重组欧盟部分对外政策领域的权力，既表现在决策方式上，又表现在权力结构上。在决策方式上，“去欧洲化”意味着“政府间主义的回归”，即欧盟对外政策决策中已经形成的超国家共同体方式被政府间方式所取代，成员国之间不再倾向于劝导和合作性谈判机制，而是转向政策让步和竞争性谈判，以最大限度地使用否决权，并强调本国利益优先。^⑧在权力结构上，成员国的“去欧洲化”意味着该国从特定的欧盟集体决策网络中脱离，进而改变这一领域的权力结构，如英国脱欧之后，欧盟理事会在安全领域的决策权力格局发生了深刻的改变。^⑨政府间主义的回归和权力结构的频繁调整导致欧盟在某些领域对外政策的一致性有所下降，可见，“去欧洲化”不仅直接改变了欧盟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也深层重构了欧盟的权力分配逻辑，加速其从共同体方式向政府间方式的结构性回摆。

另一方面，“去欧洲化”增加了欧盟对外政策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改变成员国对外决策的认知、修辞和制度背景，“去欧洲化”破坏了成员国与欧盟对外政策达成一致的条件。随着“去欧洲化”程度的加深，欧盟对外决策愈发接近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强硬外交，而非政治共同体成员之间基于规范的外交。^⑩换言之，出现“去欧洲化”的成员国在部分领域会更

倾向于考虑短期相对收益，不希望受到欧盟对外政策规范的约束。例如，在难民危机中，出现难民政策“去欧洲化”的成员国（如意大利）破坏了基于申根区制度的“第一入境国”原则与“安全第三国”原则，^④致使欧盟成员国之间相互推诿，^⑤给欧盟的难民政策增加了不稳定因素。此类“去欧洲化”现象不仅体现为成员国对欧盟的制度性偏离，更削弱了欧盟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稳定性与集体协调能力。

（二）“去欧洲化”的走向

目前，“去欧洲化”已成为欧盟内部的普遍现象，并产生了负面影响。针对其发展走向，不仅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推论，也需结合中小成员国与法德两大核心国家的现实政策加以分析。

中小成员国尤其是组建民粹政府并影响对外政策的国家，其对外政策在逐步背离欧盟的同时，外交机构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变化。以匈牙利为例，其“去欧洲化”主要体现在与欧盟的民主法治之争、反对欧盟难民政策和质疑欧盟未来发展方向这三个方面。^⑥同时，其外交机构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如外交权力集中在民粹政府手中，外交官员以本国利益而非欧盟利益为重。^⑦政策立场的背离和外交机构的调整，使得匈牙利似乎在多个方面与欧盟相抗衡。然而，在更高层级的国际事务中，匈牙利的“去欧洲化”却表现得相对克制。以其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投票为例，学者们比较了出现“去欧洲化”前后的匈牙利，以及匈牙利和其他主流国家的投票行为，发现匈牙利在联合国层面并没有与欧盟展开激烈对抗，其投票表现出了较强的务实性，并遵循了CFSP中的合作规范与文化。^⑧换言之，匈牙利虽在欧盟内部采取对抗立场，但在外部多边机制中表现出了对欧盟的制度性依附与务实取向。

以匈牙利为代表的中小成员国“去欧洲化”所呈现的双重特征，与其国家体量密切相关。中小成员国有限的战略空间与国家能力决定了其“去欧洲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策略性选择，而非在更高层次上的制度性脱钩。这种“要价”行为凸显了中小成员国对欧盟制度和规范既依赖又有所抗拒的双重结构，是一种动态博弈的过程。此外，中小成员国“去欧洲化”的发展趋势也与其核心因素民粹主义有关，民粹主义整体上不是一种颠覆性的力量，而是要对欧盟进行改造和变革。^⑨因此，即便在众多中小成员国“去欧洲化”持续释放张力的情况下，欧盟对外政策也体现出了一定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相比于中小成员国，法德两国一旦出现明显的“去欧洲化”，将对欧盟对外政策产生更深层次影响。一方面，中小成员国的“去欧洲化”通常具有策略性和局部性特点，是一种政策层面的博弈，旨在向欧盟争取更多利益，欧盟可通过政策协调缓冲其负面影响。而作为欧盟核心国家，法德两国的“去欧洲化”不仅可能重塑欧盟内部的权力结构，甚至将撼动欧洲一体化的根基。另一方面，中小成员国的“去欧洲化”多源于民粹主义政党的执政，具有一定的选举策略和机会主义色彩。而法德两国民粹势力尚未执政，主要是通过议题渗透的方式对主流政党加以影响，虽然不会直接导致制度方面的脱钩，却可能逐步侵蚀欧盟对外政策的共识规范。

在德国政治中，民粹主义的议题渗透已在部分领域初见端倪。德国民粹主义的发展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直观表现为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的上升。在2025年的德国大选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择党（AfD）获得了20.8%的选票，首次跃居第二大党，成立于2024年初的民粹主义政党“莎拉·瓦根内希特联盟”也获得了4.97%的选票，非常接近德国议会设定的获得席位的5%门槛。^⑩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显著压缩了主流政党的生存空间，导致德国政党政治

碎片化程度加深。其二，为争取选民，德国主流政党开始吸纳部分民粹主义政党的议题，如联盟党（CDU/CSU）在2025年的竞选纲领中希望大幅调整德国的难民庇护政策，^①而改革难民政策正是民粹主义政党的一贯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粹政党对传统主流政党议题设置的反向塑造能力，预计未来德国政府将针对难民庇护政策进行改革。

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对法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并开始逐步侵蚀主流议题。近年来，民粹主义政党国民联盟（RN）发展壮大，虽然尚未执政，但其民族主义的话语已逐步渗透到法国政治中，并对主流政党形成冲击。国民联盟逐步建构出一种“民族优先”的对外政策叙事，并持续推进疑欧主义、反移民和强调民族主权的政治议程，^②此类民粹话语影响了法国国内的政治生态，进而会在具体议题中侵蚀欧盟对外政策所依赖的共识规范。2024年国民议会选举中，国民联盟所获议席数和得票率均创新高，反映出民众意图寻找主流政党之外的替代方案，导致法国民意在国家治理和难民议题上体现出整体右倾和更加排外的趋势，^③形成了潜在的“去欧洲化”风险。因此，综合考虑法德两国的政治现实，需要密切关注两国民粹主义的发展动态，以判断两国是否会在特定领域出现较为明显的“去欧洲化”。

结语

“去欧洲化”不仅体现为“欧洲化”的反向进程，更深刻反映出民粹主义对成员国对外政策中规范社会化的冲击。民粹主义通过建构疑欧思潮或组建民粹政府并介入对外政策，导致成员国在部分对外政策领域出现反规范社会化倾向，进而引发“再国家化”趋势及次区域化、小集团化的行动模式，削弱欧盟对外政策一致性与稳定性。民粹主义对“去欧洲化”的推动不仅限于成员国在制度层面与欧盟的结构性脱离，更在于重塑成员国对欧盟规范共识的认同基础，深刻改变其对外政策取向。这一过程显示出，民粹主义的影响已从内政领域逐步延展至多层次的对外政策领域，并在不同政治体制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影响路径与政策取向。^④

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家的“去欧洲化”，主要发生在特定政策领域，或是集中在民粹政府执政时期。事实上，尽管部分欧盟成员国在话语上表现出对欧盟强硬的态度，但在实际对欧关系中仍以策略性妥协和利益博弈为主，未形成整体性的脱离趋势。这表明，“去欧洲化”并非“非此即彼”的断裂过程，而应理解为一种渐进的、发生在特定政策领域的演化趋势。

如同民粹主义伴随代议制民主而兴起并成为代议制民主的“阴影”，“去欧洲化”也是伴随“欧洲化”而出现的，并与“欧洲化”形成了不同力量之间的平衡博弈。“去欧洲化”目前呈现为一种开放互动的过程，未来需持续关注其发展态势及外溢效应。正如学者所指出，“如果欧洲国家要积极地塑造世界，那么他们只能团结起来，以欧盟为单位或至少以其中的核心团体为单位，发挥其稳定作用”。^⑤“去欧洲化”和“欧洲化”的动态博弈，将对欧盟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① 参见 Stephan Keukeleire and Tom Delreux,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European Union* (3rd Edition),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22, pp. 1-17. 本文所研究的是广义上的欧盟对外政策，是欧盟针对外部环境所提出的、通

过影响内外部行为体而追求利益和价值规范的多面性欧洲政策。

② 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卷四）：旧欧洲 新欧洲 1989—2005》，林骥华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46页。

- ③⑬⑭⑯ Patrick Müller, Karolina Pomorska and Ben Tonra, "The Domestic Challenge to EU Foreign Policy-Making: From Europeanisation to de-Europeanis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43, no. 5, 2021.
- ④⑤⑬ Daniel C. Thomas, "The Return of Intergovernmentalism? De-Europeanisation and EU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43, no. 5, 2021.
- ⑤⑯⑰ Michael Smith, "De-Europeanisation in European Foreign Policy-Making: Assessing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43, no. 5, 2021.
- ⑥ Robert Ladrech, "Europeanization of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The Case of Franc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2, no. 1, 1994.
- ⑦ Tanja A. Börzel, "Europeanization: How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acts with Its Member States," in Simon Bulmer and Christian Lequesne,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5-69.
- ⑧ Alec Stone Sweet, Wayne Sandholtz and Neil Fligstei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28.
- ⑨ Tanja A. Börzel, "Pace-Setting, Foot-Dragging, and Fence-Sitting: Member State Responses to Europeaniz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0, no. 2, 2002.
- ⑩ Bastien Irondelle, "Europeanization without the European Union? French Military Reforms 1991-96,"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10, no. 2, 2003.
- ⑪ Garri Raagmaa, Tarmo Kalvet and Ragne Kasesalu, "Europeanization and De-Europeanization of Estonian Regional Policy,"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vol. 22, no. 4, 2014.
- ⑫ Paul Copeland, "Europeanization and de-Europeanization in UK Employment Policy: Changing Governments and Shifting Agendas,"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94, no. 4, 2016.
- ⑬ Carla Monteleone, "Foreign Policy and de-Europeanization under the M5S-League Government: Exploring the Italian Behavior in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43, no. 5, 2021.
- ⑭ ⑯ António Raimundo, Stelios Stavridis and Charalambos Tsardanidis, "The Eurozone Crisis' Impact: A De-Europeanization of Greek and Portuguese Foreign Policie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43, no. 5, 2021.
- ⑰ Joanna Dyduch and Patrick Müller, "Populism Meets EU Foreign Policy: The de-Europeanization of Poland's Foreign Policy towar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43, no. 5, 2021.
- ⑱ David Cameron and Tim Ross, "David Cameron: The EU is Not Working and We Will Change It," *The Telegraph*, 15 March, 2014,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newstopping/eureferendum/10700644/David-Cameron-the-EU-is-not-working-and-we-will-change-it.html>.
- ⑲⑳ 斯蒂芬·柯克莱勒、汤姆·德尔鲁：《欧盟外交政策（第二版）》，刘宏松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9—180页，第124—125页。
- ㉑ Agnese Pacciardi, Kilian Spandler and Fredrik Söderbaum, "Beyond Exit: How Populist Governments Disengage from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0, no. 5, 2024.
- ㉒ Jeffrey T. Checke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Introduction and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9, no. 4, 2005.
- ㉓ Nicole Alecu de Flers and Patrick Müller, "Dimensions and Mechanisms of the Europeanization of Member State Foreign Policy: State of the Art and New Research Avenue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34, no. 1, 2012.
- ㉔ Dipanjan Roy Chaudhury, "We are Still a Player in Search for Identity: Josep Borrell," *The Economic Times*, 16 January, 2020,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international/world-news/we-are-still-a-player-in-search-for-identity-josep-borrell/articleshow/73308318.cms?from=mdr>.
- ㉕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0.
- ㉖ 杨春林：《超越左右之维：作为政治策略的民粹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
- ㉗ 田野、李存娜：《全球化冲击、互联网民主与混合民粹主义的生成——解释意大利五星运动的生成》，《欧洲研究》2019年第1期。
- ㉘ Jan Philipp Thomeczek, "Bündnis Sahara Wagenknecht (BSW) : Left-Wing Authoritarian—and Populist? An Empirical Analysis,"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vol. 65, no. 3, 2024.
- ㉙ 冯仲平：《欧洲一体化、战略自主及中欧关系》，《国际经济评论》2023年第5期。
- ㉚ 林红：《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理论关联及合流》，《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3期。
- ㉛ Philip Giurlando and Carla Monteleone, "Institutional Change, Sovereignist Contestation and the Limits of Populism: Evidence from South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0, no. 5, 2024.



- ③④ Paul Taggart, "A Touchstone of Dissent: Euroscepticism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33, no. 3, 1998.
- ③⑤ 宋新宁、涂东:《欧洲民粹主义的“疑欧”特色》,《人民论坛》2016年第S2期。
- ③⑥ 李明明:《捷克的疑欧主义及其欧洲政策探析》,《国际观察》2016年第6期。
- ③⑦ Tim Bale, "Who Leads and who Follows?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Ukip and the Conservatives - and Populism and Euroscepticism," *Politics*, vol. 38, no. 3, 2018.
- ③⑧ 李明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与欧盟成员国主流政党的应对战略——以欧债危机发生后的德、英、法三国为例》,《欧洲研究》2017年第2期。
- ③⑨ Gianni Bonvicini, "Proposals for a Revival of Permanent Structured Cooperation," *The Polish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2, no. 3, 2013.
- ④⑩ Clara Marina O'donnell, "Britain's Coalition Government and EU Defence Cooperation: Undermining British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7, no. 2, 2011.
- ④⑪ 钟准:《欧洲边缘的抉择——试析意大利、希腊民粹政府的对外政策》,《欧洲研究》2020年第4期。
- ④⑫ ④⑬ Patrick Müller and David Gazsi, "Populist Capture of Foreign Policy Institutions: The Orbán Government and the De-Europeanization of Hungar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61, no. 2, 2023.
- ④⑭ Tomáš Weiss, "De-Europeanisation of Czech Policy towards Eastern Partnership Countries under Populist Leader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43, no. 5, 2021.
- ④⑮ "Matteo Salvini Quotes," Brainy Quote, <https://www.brainyquote.com/authors/matteo-salvini-quotes>.
- ④⑯ 李宏、奇峰:《意大利民粹政府难民政策分析:动因、成效及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年第2期。
- ④⑰④⑱ 孔田平:《匈牙利和波兰与欧盟冲突的起因及其影响》,李强、段德敏主编:《十字路口的欧罗巴:右翼政治与欧洲的未来》,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203—225页。
- ④⑲ 肖伟林:《民粹主义掌权之后:制度化还是激进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11期。
- ④⑳ 何晴倩、丹尼尔·诺兰:《英国脱欧与欧盟理事会权力的再分配——基于跟踪问卷调查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欧洲研究》2020年第1期。
- ④㉑ 刘一:《欧洲边境的重筑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第220—221页。
- ④㉒ Sedef Eylemer and Nagihan Söylemez, "Policy Versus Praxis: Has the European Union Failed to Respond to the Refugee Crisis?" *World Affairs*, vol. 183, no. 4, 2020.
- ④㉓ Carla Monteleone, Patrick Müller and Tatiana Coutto, "Hungary's Populist Government and the Contestation of EU Foreign Policy Co-Oper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Dogs That Bark Do Not Bit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First published: 25 November 2024.
- ④㉔ 冯仲平:《欧洲民粹主义兴起会令欧盟解体吗?》,李强、段德敏主编:《十字路口的欧罗巴:右翼政治与欧洲的未来》,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49页。
- ④㉕ <https://www.bundeswahlleiterin.de/bundestagswahlen/2025/ergebnisse.html>.
- ④㉖ "Politikwechsel für Deutschland Wahlprogramm von CDU und CSU," https://www.csu.de/common/download/Wahlprogramm_2025_von_CDU_und_CSU.pdf.
- ④㉗ Pierangelo Isernia, et al. "Populist Attitudes and Foreign Policy Postur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ur European Countries,"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7, no.1, 2025.
- ④㉘ 张金岭:《法国政治格局的重塑:原因与影响》,《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2024年第4期。
- ④㉙ 钟准、魏康婷:《理解民粹主义外交——国际制度、国内建制与反建制对外政策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5期。
- ④㉚ 斯万·毕斯普:《让欧洲再次伟大:旧力量、新未来》,徐莹、关孔文、郎加泽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3—4页。

特约编辑 杨义成